

【一般论文】

西学视界下的旧学： 论钱锺书“以故为新”的文学史观

The Tradition Studies Under Western Perspective:
Ch'ien Chung-Shu's Ideology of Literary History on "Take the old as the New"

萧雯佳* (北京大学中文系)

Siew Wen Jia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Email: siewwj@yahoo.com

Published online: 31 December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Siew, W. J. (2021). 西学视界下的旧学：论钱锺书“以故为新”的文学史观.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2(2), 34-45.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2.4.2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2.4.2021>

摘要

作为后五四时期的文人学者，钱锺书不仅有深厚的家学根底，也经历过西洋文学的专业打磨，使其文学视野相当开阔，对东海及西海的新旧学皆不陌生。同样站在中西学的比较立场，五四时期的学者为了塑造新文学的合法性，往往侧重于译介异邦中的“新声”，策略性放大西学优点及旧学缺陷。反之，学衡派倾向于从西洋古典文学中吸收养分，并将传统的国学研究放置在西学视界下观照。遗憾的是，学衡派在新文学运动中被视为反动者，他们的研究思路在新旧学的紧张对峙下被遮蔽。1932-1935年间，钱锺书作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生及上海光华大学的年轻讲师，在《清华周刊》、《新月》月刊、《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风》半月刊、《天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的中英文书评及论文。在早年的评论文章中，钱锺书评价宋代文论及诗赋时，借用宋调“以故为新”的文论，探讨如何突破文学势力圈的笼罩。此外，他的英文论文不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马华文学。

仅与海外汉学家对话，也在学衡派将旧学纳入西学视界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强调唯有在中海与西海及新旧学的会通中，才能将古代文学适当地安置在文学史与艺术殿堂中。

关键词：后五四、钱锺书、吴宓、学衡派、书评

Abstract

As a Post-May Fourth scholar, Ch'ien Chung-Shu had gained a deep foundation for tradition studies from home, as well as underw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Western Literature. Thus, his literary perspective was much wider, familiar with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 studies within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 While compar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the May Fourth scholars tended to promote “new voices” from the foreign land, taking strategic of enlarged the advances of Western studies plus highlighted the defect of Chinese studies, in order to shape the legality of New Literature. On the contrary, the Xueheng School (学衡派) tended to absorb new nutrients from the Western Classical Literature, even analyzed the Chinese tradition studies from Western perspective. Regrettably, the Xueheng School was considered as the opposition during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their approach usually obscured by the tens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ew and tradition studies. Between 1932-35, Ch'ien Chung-Shu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singhua University, then became a young lecturer in Shanghai Guanghua University. He had published a seri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book reviews, including papers in *Tsinghua Weekly*, *Crescent Monthly*, *Ta Kung Pao*, *Guofeng Bimonthly*, *T'ien Hsia Monthly* publications. In early review articles, when Ch'ien Chung-Shu analyzed the Song Dynasty literary theory and poetry, he borrowed the ideology of “take the old as the new”, discussed about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literary power circle. His English papers not only formed dialogue with the overseas sinologists, but also moved forwar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Xueheng School, which included the tradition studies within Western vision. He mentioned that through the meetings of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 studies within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 we could place the Classic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art palace.

Keywords: Post-May Fourth, Ch'ien Chung-Shu, Wu Mi, Xueheng School, Book Review

一、前言

作为后五四时期成长的学人，钱锺书（1910-1998）自小在父亲钱基博的指导下打下较深厚的经学根底，19岁时曾拜清代同光体大诗人陈衍为师，在诗坛耆老的亲炙下学写旧体诗，其旧学的文学素养与趣味可见一斑。然而，钱锺书14岁考入美国圣公会在苏州创办的桃坞中学，后转入无锡辅仁中学，由于教会学校的科目多以英文讲授，钱锺书在中学期间就具备良好的英文基础，在1929年秋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又称西洋文学系）。当时，清华外文系的师资雄厚，里头的导师大部分皆学贯中西，课程设置上由叶公超讲大学英语、王文显开设莎士比亚戏剧、温源宁教十九世纪文学及批评、吴宓教古典文学及浪漫诗人等，亦有外籍教授如温德(Robert Winter,1887-1987)、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等人开设英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课。¹由此可见，大学期间的钱锺书身兼中、西学的文学训练，其成长及教育背景赋予他双重的知识脉络，因此他日后的研究路径得以贯通中西，寻求东海与西海的“会通”。

在1920-30年代，同时具备西洋文学背景及中学根底的学人数量不少，但在五四话语的笼罩下，大部分人倾向于将最新的西学知识与文学流派引入中国，以便对中国的新文学创作带来直接的刺激作用。在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除了胡适等人在小说的研究路径上有所突破，其余的诗文领域多数固守在自身的传统文学堡垒中。钱锺书在留学以前，较早地意识到将中国旧学放置在西学视界下的重要性，这与学衡派重视国学与西学的理念有暗合之处。钱锺书的古代文学研究蕴含比较文学的视野，从其早年的文学评论及书评中可看出端倪。

二、以故为新：宋代文论及诗赋

作为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及上海光华大学的年轻讲师，20多岁的钱锺书在1932-1935年间用中英文发表过不少书评及文学评论，除了直接评论外国文学著作，他对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亦保持关注，不仅通过撰写书评将之介绍到中国，也采用英文论述直接与外国学者对话，试图将中国古代文学放置在西方的文学语境中作比较。钱锺书在阅读上涉猎广泛，对中西学皆不陌生，因此能直接与海外汉学家对话，亦能纠正他们在研究上的偏颇或失误。难得的是，钱锺书不仅仅通晓数种外语，他还具备创作旧体诗的经验，对不同时代的旧学如何突破前代的文学势力圈有切身之感，亦能从创作经验中看出具体文本的匠心与局限。在历代文学中，钱锺书对宋代文学有着持续性的关注，他在青少年时期跟随清代同光体诗人陈衍学写旧体诗，1930年代在柳诒徵、张其昀等人于南京创办的《国风》学刊上发表过百余篇旧体诗，编为《中书

¹爱默，《钱锺书传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页30。

君诗》自费出版。

钱锺书对北宋文人苏轼怀有极大的兴趣，他就读于清华时曾关注汉学家李高洁 (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 1894-1945) 等人在 1931 年将苏东坡的作品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译著，1932 年在《清华周刊》上撰写书评 *Book Note II*²，指出此译作的谬误。钱锺书首先指出译者将苏东坡的赋、记等不同文体笼统的译为“prose-poems”，模糊了传统文体的界限。接着，他指出苏东坡作品中的趣味性及哲理思维在翻译中变得笨拙及扁平，没法彰显出苏东坡原有的文学格调。Mr 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 (1864-1954) 在序言中曾表示阅读这部译作的惊奇感，好比当年济慈最初读到却泼门译的荷马史诗那样，钱锺书觉得这是过誉之词。除了指出零散的错译，他还不满译者在〈导言〉中像历史学家及年代史编者那样大幅度介绍宋代文化背景，认为其忽略了更具体的宋诗介绍。值得肯定的是，此书的精装版采用了大量精致的木刻插图，让苏轼的精神在其他媒介中得以再现。无独有偶，吴世昌在 1932 年 4 卷 3 期的《新月》上亦刊载题为〈苏东坡集选译〉的中文书评，将译文与原文对照后，列举出译者一系列的谬误，其观点与钱锺书颇为相似。

时隔两年多，李高洁再度翻译及出版英译《苏东坡赋》时，却专门请了钱锺书为其写序。这篇英文序言在 1935 年收入译著前，曾以 *Su Tung-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 (〈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 为题，刊载在 1934 年 1 卷 2 期的《学文月刊》及 1935 年 10 期的《光华年刊》上。³为了让英语界读者更贴切地理解苏东坡，钱锺书在序言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宋代文学批评（诗话）与诗人身份重叠的现象，并由此入手分析宋代的时代精神具有近乎病态的反省意识。这种诗话渗透到宋诗创作中，体现为宋代诗人好用典故彰显自身的博学，这时出现的哲理诗有大量直露的思想与直说。然而，钱锺书在文中笔锋一转，认为苏东坡的作品并没有笼罩在类似的时代精神 (the spirit of his age) 中，他的作品颠覆了宋代理学家所谓“克己复礼”的道学思想，更加强调人性自然、豁达的一面，其艺术风格贵在简单与自然。序言最后的部分，钱锺书将重点落在分析苏东坡赋的成就，认为苏东坡赋“激活了一种已被遗忘几个世纪的艺术” (an art rediscovered that has been lost for several centuries)⁴。在苏东坡笔下，原本僵化的赋体融入了他惯有的奇思妙想、轻快风格、幽默及其妙用博喻等特征，重获新生。在此，钱锺书巧妙地将这种风格变化形容为从“正步操练” (military drill) 转化成“闲庭信步” (swinging gait)，呈现出一种舒缓的文学节奏感。相较于南宋

²Book Note II, *Tsinghua Weekly* 《清华周刊》XXXVI (1932), 见钱锺书著,《钱锺书英文文集》(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页 9-11。

³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 见钱锺书著,《钱锺书英文文集》, 页 43-52。

⁴研究者龚刚指出钱锺书对赋体的发展史勾勒有误, 见〈浅析钱锺书对苏东坡赋的英文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第 3 期 (2010 年)。

郎晔选注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钱锺书认为李高洁的注释与点评类似宋代诗话，偶尔流露出独到见解，即使是中国学生读起来也会有启发。对于汉学家“以西眼看中学”时的隔阂，钱锺书将苏东坡介绍到英语世界时更为轻松自如。钱锺书在 1934 年撰写的序言对苏东坡的赋评价甚高，主要是肯定了苏东坡赋为这古老文体注入新格调，突破了文学势力圈带来的局限。

除了宋赋，钱锺书对宋诗的兴趣可谓贯彻其学术历程，1940、50 年代陆续完成的学术专著《谈艺录》《宋诗选注》是最佳例证。可贵的是，他在阐述宋诗的艺术特色及分析宋代诗话时，往往将古人的想法与西方既有的哲学思维巧妙地结合，以肯定宋代诗话充满哲理性思维的面向。时人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惯性思路，往往将唐诗与宋词对举，但钱锺书的文学史观倾向于描绘一种历史事实，秉持“连续性的文学观”，因此他对某种文体延续性发展的现象更为关注。面对唐诗的文学势力圈，钱锺书在分析宋诗特征时，格外强调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苏轼在〈题柳子厚诗〉曾言：“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锺书对这观点颇为赞赏，他在《宋诗选注》中，借用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的原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来评价其诗文的成就。苏轼文学的豪放风格乃是文学定论，但钱锺书认为所谓豪放必须放置在“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语境中理解。钱锺书援引近代术语中的“自由”定义，认为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不仅强调作文如“行云流水”般自在，同时也很谨严的提出“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⁵，这段引文在 1934 年所写的序言中亦出现过。

在《宋诗选注·序》里，钱锺书提到宋诗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恰恰是其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的精益求精，在“小结里”有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但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特别亮眼的转变，其风格与意境多多少少落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势力圈里：

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⁶

⁵钱锺书，《宋诗选注·苏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页 61。

⁶钱锺书，《宋诗选注·序》，页 11。

在对比唐人、宋人及明人的文学观念时，钱锺书用皎然《诗式》中的“复古通变体”这一条，说明唐人意识到“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复古”的目的是达到“通变”。宋代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之三》中则强调“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可见宋代诗人虽然落在文学势力圈内，仍努力地在合中求异。明人鄙视宋诗“学唐诗而不像唐诗”，但钱锺书指出这种“不像之处”恰恰是宋诗的标准立异之处。

《谈艺录》里，钱锺书在新补的宋代黄庭坚诗注中，亦围绕“以故为新”的概念，展开中西文论的比较。按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记载，北宋的梅尧臣（字圣俞）最先提出“以故为新”的见解：“窃谓圣俞二语，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作为江西诗派代表，黄庭坚在《再次韵杨明叔·引》则提过“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此诗人之奇也”，他所谓的“以故为新”是建立在创作技巧上的“点铁成金”或“脱胎换骨”，在意象更新和发展上有小突破。这一见解为宋调奠定明确的作诗原则，而钱锺书在评论古代文学时，亦相当看重这种“守旧出新”的路径。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将这观点与近世俄国形式主义的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 Shiklovsky, 1893-1984）提出的“陌生化”理论对举，强调“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 (habitualization, automatization)，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defamiliarization)，或亦曰使文者野(rebarbarization)”⁷，所谓的陌生化得在掌握“故与常”的循环关系后，才能凸显其变形或差异感。在“以故为新”的逻辑链条中，“故”与“新”并非一组对立的概念，而是形成相互阐发、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换言之，唯有在摹仿与继承中掌握了固有的技法，才能为所谓的“新”寻找到发力的支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三、西学视界下的旧学：钱锺书与学衡派吴宓的“会通”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陷入话语争夺的白热化时期，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论”逐渐被左翼文学的“革命文学论”覆盖，由特定的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话语争夺不仅发生在新文学当中，也蔓延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当时尚在清华大学念书的钱锺书坚持以美学格调及文体延续性的史观来叙述文学，在两派皆不讨好的状态下坚持独立的文学判断。1932年10月至1933年6月，22岁左右的钱锺书在叶公超主持的《新月》月刊《书报春秋》栏目上，一口气连载了5篇署名“中书君”的书评，展现其锐利的批评锋芒。其中，1932年11月刊出的《〈评〉中国新文学源流》（《新月》月刊4卷4期）及1933年6月刊出的《〈评〉近代散文钞》（《新月》月刊4卷7期）的对象明

⁷钱锺书，《谈艺录：补订重排本》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页42。

确，读者反响也较大。周作人在 1932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乃是在辅仁大学系列讲座的整理稿，撰写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发展及经过。他在援用及说明古代文学作为资源时，往往影射当下的现况。在钱锺书的书评里，他首先批评周作人忽略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将划分文体功能的“文以载道”及“诗以言志”混淆成内容上的对立，把古代文学的发展解释为“言志”及“载道”这两种潮流的起伏。⁸此外，他也质疑周作人将明末新文学运动视作新文学源流的合理性，认为周作人的文学革命论亦建立在政治成败上，而将成功了的文学革命视为遵命文学，进而忽略“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昆的命，同是一条线下”⁹的文学革命。

在另一篇书评里，钱锺书则质疑沈启无编、周作人写序的《近代散文钞》独尊明代小品文的作法，他大胆地提出：

假使“近代”这个名词，不仅含有时代的意思，而是指一种风格，像“唐诗”“宋诗”一样，不是 Chronologically Modern, 而是 Critically “Modernistio”，那末明以前的文章，明以后的文章，够得上“冰雪小品”的，不知多多少少，何以偏偏又限止于明末清初？¹⁰

在此，钱锺书认为“小品”与“极品”的分疆是风格上的差异，他将“小品”文的格调命名为“家常体（Familiar style）”，认为历代的书牍、笔中都存有自由自在、介于骈散雅俗（Bookish/Vernacular）之间的家常体。钱锺书亦批评“过去已是给现在支配着的；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我们常常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对这种“以今律古”的做法表示不满。钱锺书后来在《谈艺录》里谈论的“诗分唐宋”论，在此书评已初见端倪，他将“时代”理解为一种美学格调或时代精神，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调进行反驳。

1933 年 8 月起，从清华毕业的钱锺书到上海光华大学（前身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担任外文系讲师，开设了西洋文学和文学批评两科，授课之余还兼任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ese Critic*）的特约编辑工作。他在 1932-1935 年间的文学评论或论文主要以英文撰写，有些主张与学衡派的文学理念暗合。例如，钱锺书在 1933 年撰写的英文论文 *On 'Old' Chinese Poetry*（〈论中国旧体诗〉）开首就提到：

中国新文学运动带来的后果，即古代文学与后来者之间形成断裂。中国文学被切割成两段——旧的与新的。这种断裂自然而然引起对古代文学的价值作全盘重

⁸关于钱锺书与周作人之争，可参阅张丽华，〈通向一种“参差对照”的史观——对钱、周之争的再思考〉，收入《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⁹中书君（钱锺书），〈〈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月刊第 4 卷第 4 期（1932 年）。

¹⁰中书君（钱锺书），〈〈评〉近代散文钞（两卷）〉，《新月》月刊第 4 卷第 7 期（1933 年）。

估 (a complete transvaluation)。¹¹ (笔者译)

相较于新文学家指责旧诗形式僵化，钱锺书通过中西诗学的比较，指出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文学传统相比，在内容上较少出现长篇的爱情及哲理诗，但他在结尾处不忘强调“同中求异”的重要性，认为“谴责苹果树结不出桃子”的作法是任性的，毕竟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学各有特点，作中西比较是为了凸显其异同之处，而不是给予优劣或高低的价值判断。

谈到钱锺书与学衡派吴宓的师生关系，他俩对旧体诗皆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在1934年前后有过以诗唱和的文学互动。钱锺书将自编的旧体诗集赠送给吴宓后，吴宓回赠一首〈赋赠钱君钟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赞扬钱锺书：“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赵传家业，气胜苏黄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¹²。作为师辈的吴宓向来十分赏识钱锺书，这首七律前四句较为准确地介绍了钱锺书的文学知识结构。后来，钱锺书在1935年6卷3、4期的《国风》半月刊上，用颇长的诗题〈雨僧师赐诗，奖饰溢分，以余谓师孤标高格，而伤心人别有怀抱，大类希腊古悲剧中主角，乃云悲剧终场吾事了，感呈一首〉，交代了他俩诗歌唱和的缘由，并在诗中赞赏吴宓具有“独行开径古争强。我法凭人说短长”¹³的一面。

1937年，远赴英国伦敦留学的钱锺书收到英文刊物 *T'ien Hsia Monthly* (《天下月刊》) 寄来的《吴宓诗集》，请求他写评论。钱锺书回复编辑时，在信中提到吴宓面对新文学运动的姿态，宛如堂吉诃德冲向风力全开的风车，下场是悲剧的，但勇气可嘉。与其说吴宓继承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他的自传式情诗及恋爱经历，更多的流露出中国的浪漫诗人气息，与温源宁在《一知半解》(*Imperfect Understanding*) 中所描摹的形象高度吻合。在结尾处，钱锺书谈到吴宓作为师长辈对后学的影响：

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学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了“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国“旧”文学于其视界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十五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synoptical)的学识。¹⁴

钱锺书肯定了学衡派吴宓身上具备深厚的西学底蕴与传统之学，能够在西学视界下给

¹¹On 'Old' Chinese Poetry, *The Chinese Critic* 《中国评论周报》VI,1933, 见《钱锺书英文文集》，页12-22。

¹²吴宓，〈赋赠钱君钟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转引自爱默：《钱锺书传稿》，页43。

¹³中书君（钱锺书），〈中书君诗〉，见《国风》半月刊第6卷第3、4合期（1935年）。

¹⁴Ch'ien Chung-Shu, *Correspondence: To the Editor-in Chief of T'ien Hsia* (1937年3月7日信), *T'ien Hsia Monthly* (《天下月刊》) 1937 IV, 见《钱锺书英文文集》，页71，中译参照[美]胡志德著、张晨等译，《钱锺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页5。

予“旧”文学较合理的位置。吴宓于 1917 年赴美留学，他在归国前撰写过一篇〈论新文化运动〉，阐述他所理解的文学发展规律：

今即以文学言之，文学之根本道理，以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细究详考，当知其然。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¹⁵

同样是留洋学生，吴宓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中国新体白话诗不以为然，认为文学的根本道理是在摹仿，经历一段时间后才能达到别出心裁的创作。吴宓批评中国新体白话诗“不摹此人而转摹彼人，舍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模范”，实乃暗效美国自由诗（Free Verse），而此诗的源头是法国 30-40 年前的象征派（Symbolists），但这只是西方诗学的一小派。在 1922 年 9 月出版的《学衡》杂志中，吴宓撰写〈诗学总论〉时强调诗不可无音律，谈及了希腊拉丁文之诗有长短音律（Quantity Metre）、英诗有轻重音律（Accent Metre），至于中国诗的平仄则是第三种音律，以字音之高低（Pitch）定之。¹⁶在文学史观上，吴宓强调“文学的延续”，但不排斥以西方的传统文学作为中学的参照系，他在 1930 年代撰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讲义《文学与人生》中，谈到“传统与进步”的辩证关系，提出“进步是传统的不断吸收与适应”（Progress is a Continual assimilation of Tradition）¹⁷，这观点与钱锺书的“以故为新”论有相通之处。

此外，钱锺书对待旧文学的理念与学衡派的态度具有同构性，学衡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作新文学的对立面，而钱锺书将复古也视作文学革命的一环，肯定了学衡派“寓新于复古”的努力。1934 年，钱锺书针对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撰写〈论复古〉一文时，提出复古未必是逆流或退化，古典主义亦是一种革命：

从现在郭先生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说来，唐宋的“复古”论自然是“逆流”或“退化”了；但是，假使有一天古典主义翻过身来（像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一样），那末，郭先生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似乎也有被评为“逆流”的希望……有“历史观念”的人，“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但是，因为他有“历史观念”，他也爱恋着过去，他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他知道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¹⁸

¹⁵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原载 1921 年《留美学生季报》第 8 卷第 1 号，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页 56。

¹⁶吴宓：〈诗学总论〉，见《吴宓诗话》，页 71。

¹⁷吴宓著、王岷源译，《文学与人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页 76。

¹⁸钱锺书，〈论复古〉，《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11 期（1934 年 10 月 17 日）。

钱锺书在清华就读期间，英国批评家瑞恰慈在课堂上介绍过艾略特的诗作与批评文章。这里提到的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很可能是以艾略特为代表，而钱锺书在此借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提到的“过去的现在性”，来阐释文学与传统的关系。传统并非通过继承权来获得，而是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得以传承。艾略特指出作家的历史意识牵涉到感知力，唯有在创作中意识到永恒与现世相结合，才能敏锐地感知自己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对此，钱锺书指出文学革命只是一种作用（function），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多少带些复古，哪怕是推倒一个古代而推举出另一个古代。然而，若是忽略了“历史的连续性”这一事实，而将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肯定不会成功。钱锺书将古代文学研究倒序至“过去的现在性”，他的研究注重描绘出文学发展史，尤为关注文体及风格的演变痕迹。

从研究路径看，钱锺书的文化抉择趋向于多元并存的状态，他的文学观念不仅打破了中西学的隔阂，在倡导新学研究的大浪潮中，也不忘为旧学研究开辟新途径。吴宓将旧学放置在西学视界下的研究方法，在钱锺书看来不失为比较文学的突破口。他在1935年撰写的 *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谈及中国古代戏曲在西方成为新的关注点。钱锺书以西方的经典戏剧作参照，提出中国戏曲的悲剧在结构特征上，倾向于落幕前弱化最高激情和最深苦痛，使读者渴望着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从白璧德的后期论著〈卢梭和浪漫主义之中国古典主义〉这节，钱锺书引述出中国缺少悲剧与缺乏“伦理的真诚”有关，他进一步解释中国的伦理要素具备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伦理要素之间的冲突被弱化了，所以难以产生类似西方戏剧中因宿命而产生的悲剧。钱锺书有意识地将西方戏剧与中国戏曲作比较，提出这种研究法好处颇多：

它有助于比较文学修习者恰如其分地看待中国戏曲在艺术殿堂中的位置。我一向认为，比较文学的修习者如果能将中国古典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他们将会发现许多新的研究资料，这有可能会使他们对西方批评家确立的批评教条（*dogmatic critical*）加以重大修正。¹⁹

此外，钱锺书亦指出就具体文学作品作比较，可让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的修习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批评家面对不同的研究资料，因而生产出不同的文学原理，无论是源自外国文学抑或自身文学传统中的审美体验，都能给研究者带来新的刺激，进而更好地理解本国的文学传统。

¹⁹*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 from *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1935，I，译文参见龚刚，《钱锺书爱智者的逍遥》（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页248。

四、结语

1940-50年代,钱锺书在抗战期间创作出长篇小说《围城》,使他在新文学史中得以留名,而他作为学术专著出版的《谈艺录》《管锥编》等也获得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其实,他有些看似新颖的文学史观在1930年代的书评及英文论文中已有雏形,其早年的文学趣味及学术倾向是本文的考察重点。同样具备中西文学的比较视野,新文学家如胡适、陈独秀、茅盾等人站在文学革命立场上援引西方资源时,往往重视中西学当中的“新学”,强调将西方最新的文学流派及创作理念引入,以便新文学能够从中汲取所需的养分。在推翻传统及强调文学进化论的思路下,西学的优点及中国旧学的弱点被策略性放大,以塑造新文学的合法性。反之,站在学衡派立场的吴宓、梅光迪等人受过专业的西学训练,他们意识到西学亦含有新流弊,因而更推崇从中、西学的经典传统中去寻求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将西学里的古典文学与传统国学对比,列举两者的异同性。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钱锺书的文学史观及研究路径较贴近学衡派的思路,但他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亦不排斥,对不同时空及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源流持有包容的态度,认为文学的审美标准应趋向多元化,研究者在接触及积累各种文学资源后,反而能在东海、西海中寻找到“会通”之处,继而将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安置到世界的文学殿堂。引入比较文学的视野,是为了拉近彼此的关系,而非造成文化上的排外或妄自菲薄。

【征引文献】:

一、中文著作

- 钱锺书，《宋诗选注·苏轼》（195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谈艺录：补订重排本（上）》（1948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爱默，《钱锺书传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 龚刚，《钱锺书爱智者的逍遥》，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
- 胡志德著、张晨等译，《钱锺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 吴宓著、王岷源译，《文学与人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二、期刊论文、文章

- 中书君（钱锺书），〈（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1932年）。
- ，〈（评）近代散文钞（两卷）〉，《新月》月刊第4卷第7期（1933年）。
- ，〈中书君诗〉，《国风》半月刊第6卷第3、4合期（1935年）。
- ，〈论复古〉，《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11期（1934年10月17日）。
- 龚刚，〈浅析钱锺书对苏东坡赋的英文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第3期（2010）。
- 张丽华，〈通向一种“参差对照”的史观——对钱、周之争的再思考〉，收入《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三、英文文献

- 钱锺书，《钱锺书英文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 Book Note II, *Tsinghua Weekly* 《清华周刊》XXXVI (1932)
- On 'Old' Chinese Poetry, *The Chinese Critic* 《中国评论周报》VI (1933)
- 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 (1935)
- 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 from *T'ien Hsia Monthly* 《天下月刊》I (1935)
- Correspondence: To the Editor-in Chief of T'ien Hsia, *T'ien Hsia Monthly* 《天下月刊》IV (1937)